

记陇西和平解放中的敌我斗争

赵建基

解放大西北的炮声打响了。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二兵团沿渭河及西兰公路分兵解放甘肃的部署，陇右工委从1949年4月13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发展新党员的紧急通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就开始了陇右游击队的组建工作。经过将近4个月的准备，于1949年8月4日夜晚在陇西文峰镇小湾里村地下党员邸建邦同志的家里召开了工委会议。列席会议的有我和王凤贤等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研究成立了陇右游击队司令部，决定：毛得功任司令员、陈致中任政委、杨友柏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焕章任第二副司令员、夏尚忠任第三副司令员、万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牙含章任副政委。会后，一面派专人去陇西、渭源等县通知各支部参加游击队的地下党员在陇西县文峰镇鄂窑沟（有的材料误写为安阳山）王发元家中报到；一面给陇西、渭源两个伪自卫大队分别送了动员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的信件。

同年8月8日将已报到的200多名游击队员分编为4个中队：杨友柏兼一中队队长、王凤贤任副队长；毛得功兼二中队队长、赵锡林任副队长；肖焕章兼三中队队长、张建国任副队长；夏尚忠兼四中队队长、辛万年任副队长。一、二、三中队全是来自陇西、渭源、临洮各支部的共产党员，唯独四中队是起义的国民党官兵。从陇西出发，路经渭源、会川，到达临洮后，游击队不断壮大，已由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

游击队员正从各地向鄂窑沟集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派人在紫来乡仙家门村侦察桦林山“土共”的活动情况。工委当即派徐振武、陈清海两同志前去捉拿，大约在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将人逮到。经审查原来才是陇西与“朱骨头”齐名的中统特务李海元。工委决定：解放陇西的和平协议达成就将李海元作为一名罪犯投入人民监狱；否则就在城墙下枪毙，然后开始武力攻城。

在人民解放军正向全国进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了天水就要攻取兰州，陇右游击司令部动员陇西自卫队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的信件已经送到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还派特务四出活动，他们想干什么？不是负隅顽抗和我们较量，便是给我们提出的和平谈判设置障碍。这就说明反动派在他们已濒临灭亡的时刻，还想苟延残喘，侥幸求得一逞。真可谓“不见棺材不落泪。”

对中统特务李海元的处置办法决定之后，游击队便整队出发，命令按一、二、三、四队的次序沿沟而上。途经安阳山到黄家门，部队暂停下来。经研究：一、二中队和司令部进驻赵家湾；三、四中队进驻牡丹山。

8月9日，讨论了如何攻城的计划。晚饭后，向陇西城进军，定口令为“解放。”

一路疾趋如风，突然部队在距城约10华里的一条沟里又停下来，司令部通知我辨认侦察队抓住的三个人。我疾步前去一看，才是我发展的三个地下党员，即：胡中和、仙遇道和胡自新同志。他们对我说：“有个国民党的兵，拿着一颗手榴弹来吓唬人，自吹能炸平一座山，能毁掉一个村，并闯到一户人家，发现有个大姑娘，便如禽兽一样进行强奸。我们就把这个家伙拉到山上打死后填到地窟里了。我们怕风声走漏，国民党追究，就前来找你。”话后，司令部研究，批准他们三人参加游击队，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大约又走了10多里路，就到王家坪和春场的中间地带安营下寨，听候命令。一回儿不知从哪里给游击队员送来了米汤，又一会

儿传来王凤贤从城南逮住了两个特务。同志们正在高兴地谈论的时候,有位同志前来通知我和汪炳锡同志迅速去司令部接受任务。我们就和这位同志一同前去。在去司令部不到 1000 米的地方就设了三道岗哨,都以口令的第一字作为通过的信号。对一个刚出校门的人来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

我们到了司令部接受的任务是给和谈会作记录并草拟协议。参加和谈的我方代表有:司令员毛得功、政委陈致中、副司令员杨友柏、副政委万良才,工作人员有我和汪炳锡同志。陇西的地方代表有:王仲阳、苟少五、张和平、宋步蟾、侯豫洲、张济生、王蔺如、柴庆丰等所谓的“八大绅士”,还有联络双方的杨华圃。

和谈会议开始,政委陈致中首先向“八大绅士”宣讲了我党中央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文,简略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副政委万良才宣讲了我军“立功受奖”的对敌政策。明确指出:凡国民党官兵,不论职位高低,罪恶大小,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一律从宽处理;凡率兵起义,反戈一击,为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均给予奖励。

会谈之后,司令员毛得功宣读了经双方协商达成的五条协议,即:第一条,不打一枪一炮,和平解放陇西城;

第二条,成立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负责治安事宜;

第三条,改编陇西自卫队为地方人民武装;

第四条,保护我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五条,筹集步枪 50 支、手榴弹 120 枚、子弹 1200 发、军费若干,支援游击队。

对我们逮住的两个身携手榴弹的人,由于达成了协议,也就随即释放了。

双方签字后,司令员毛得功对和谈的成就做了肯定,最后说,我们将兵分两路沿城南和渭河向渭源进军,请“八大绅士”回去后迅速转告国民党自卫队官兵,不要惊慌。

和谈结束了。司令员毛得功、副司令员杨友柏领兵西进。副政委万良才率领我和汪炳锡、徐振武、陈五旦(清华)进城执行协议确定的任务。当我们和“八大绅士”走到东关佛慧寺时,与伪自卫队大队副张汉三相遇。停了片刻,互相作了介绍,就径直到达工商会长苟少五的二层楼上。万良才同志通宵达旦接见各界拜访的人士,其中就有陇西师范校长王利仁。我和汪炳锡同志就在楼房的套间外迎来送往,警卫人员徐振武、陈五旦在楼房门前持枪警戒。

8月10日在鼓楼根下郭玉柱的饭馆吃了早饭,遵照万副政委的安排,我去城关、紫来、文峰等地通知王念贤、刘照凡、姚发成、杜映华、陈嘉猷、白树钾、孙士俊、傅作舟等40多位地下党员进城报到,参加接管工作。汪炳锡负责将筹集的枪支弹药速送游击队,万良才负责主持成立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当我准备动身的时候,伪自卫队大队副张汉三来了,他向万良才谈了枪支弹药的筹集情况,说枪支给两个中队各分派了20支,给警察局分派了10支。派给伍云青中队的催了几次还未拿来,现在只筹集了30支。当话说到这里时万良才生气了,并严厉指出伍云青不执行和平协议的反叛行径。他们还在谈着,我就告辞执行任务去了。待我下午回来,听汪炳锡同志说:伍云青的20支枪仍未拿来,只好将筹集到的30支破旧不堪的“七九”枪送去。走到半路接到司令部的信,说沿途拣了不少苏式“水连珠”,现在每人一物三件。叫把协议定的枪弹作为机动储存。我带回后交邸建邦同志保管起来了。这件事情并不只是20支枪给不给的简单问题,而是潜伏着危险的信号。与此同时还有一件城门开后又关锁的怪事。当时并不甚明了。过后乃知仍是伍云青反叛行径的继续。和谈前,伪自卫队为了防范共产党,将城门长期关锁;和谈协议达成后,敞开让我们进了城。第二天清早我去紫来、文峰,发现又将城门关锁,返回要了伪大队副张汉三的亲笔信才放我出城。回来时,若不是我发展的地下党员、伪自卫队的文书傅作舟叫门,就又进不来了。和平解放陇西城的协议未达成前,为

了防共关锁城门倒不为怪；协议达成大开城门将我们迎接进去，随后又关锁起来，这不是另有阴谋还能说明什么？

我进到伪县政府，正巧万良才同志主持各界人士会议，选举陇西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我走向会场时，地下党的朋友王寿山、荀子敬便悄悄地对我说：“你注意一点，伍云青派出5个探子，要绑架你们。”这时万良才同志正在讲话，无法立即报告，使我惶恐不安。万良才同志话刚讲完，突然有人从院内高喊：“解放军已到东铺，杨政委（万良才）赶快去迎接。”万良才同志率领我们4人和参加会议的人，立即去东铺，其中相随的有伪自卫队大队副张汉三、陇西旅兰“首阳学会”常务干事石廷选。到东铺后，解放军一个也未来。其他人都回城了，我们4个人被万良才同志领到地下党的朋友蒲斗行（对粮食生意人的称呼）家。万给蒲斗行说：“叫你老婆子赶快做饭，我们吃了还要进城。”这时已经日薄西山了，回城还得走20华里，由于我身患痔瘕，步行艰难，这句还要进城的话，我实在有点不赞成，但又不能启齿。在我们等饭的时候，万良才同志说：“迎接解放军，这是个金蝉脱壳之计，现在就可以组织力量，加强防卫，来对付这些坏家伙。”不一会做的面片子端上来了，正吃之际，一声惊雷，紧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一直下了个夜深人静。我暗暗高兴，一夜长眠，恢复了精神。雨过天晴的第二天早晨，我们5人信步到了陇西城。据讯伍云青白天绑架我们的阴谋未逞，便在昨夜晚又派5个特务隐蔽在东关土城墙后妄图暗杀我们。天哪！要不是这场大雨把我们留在东铺，我们的血就要流在这块前无人家后无店的阴霾之地。狼总是狼，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孝子贤孙在狗命已操于我手的情况下还如此狠毒。根据这个情况，万良才同志布置了一番关系我们人身安全的警卫工作，然后召集已报到的地下党员开会，分别安排各项紧急任务，并宣布邸建邦任组织科长、赵建基任宣传科长、汪杰任社会科长、汪炳锡任秘书。会后我发现王念贤有点情绪，晚饭后我就告诉了万良才同志。万笑着说：“噢！还有情

绪，他的工作计划任政府的教育科长，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先担任个副官”。我又问：“副官是个干啥的？”他说：“其他别人不管的事他都管，其中包括后勤。”之后，我通知了王念贤同志。这夜，万良才同志就和我们4个住在伪县长的卧室里。为了我们的安全，也为了让我们疲劳了三四天的人能够安安然然睡一觉，万良才同志除安排了室外的警卫之外，还指定地下党员孙士俊、傅作舟在我们睡的套间外持枪值勤，并定当晚的口令为“成功”。

在进驻陇西县城4天的日子里，我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杀机吓倒，也未处在地下，一直很有秩序的工作着。万良才同志给我讲：伍云青只能偷偷摸摸，他不敢公开杀害我们。除了一野已经解放天水将要路过陇西攻打兰州这个大气候之外，我们在陇西县城的力量也能和他这个小小的中队较量一番。

经过准备，我于12日在伪县政府大堂后的一个大会议室召开了部署去乡下作宣传动员工作的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员，也有来自兰州、西安等地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正在开会中间，突然从东面传来了接连不断的机枪声。为了预防飞弹，我就把开会的人领到会议室外隐蔽起来。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枪声停了。我们又回到会议室分析了响枪的原因，觉得此处不宜再留，加之万良才等4位同志不知去向，我断然决定立即撤出伪县政府，探实响枪的原因，同时寻找万良才同志。当我们出了会议室望见对面有个人向我们走来，到跟前才看清是我们进城后刚认识的伪自卫大队一中队队长伍居泽，没待我开口，他就抢先说：“赵同志，刚才响枪是啥原因？”本来我不知道原因，但为了稳住这个刚起义的伪军官，我便一本正经地问他：“伍云青的态度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说：“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杨政委命令解放军以武力迫使他交械投降。”他又说：“老百姓非常恐慌。”我说：“我们上街正是要给老百姓去作宣传解释。”我对他询问的一席回答，好象他全相信了。然后我们迅速离开了伪县政府，向鼓楼方向前进，走过县门街望见鼓楼洞里熙熙

攘攘，临近一看才是十几匹战马，还有两个穿灰色军装、持枪巡逻的士兵。果然在我给伍居泽答复的话上来了，顿时十分高兴，疾步走到他们面前，问了句：“同志，你们辛苦了？”其中一个反问我：“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回答说：“是陇右游击司令部的。”他又问：“你是否带枪？”我说：“带枪。”那两个人立即变了脸，将我带的枪夺去。并说：“你留在这里，其余的都走。”接着又说：“把这个老的也留下。”这个老的就是我的小学老师，又是我发展的地下党员刘照凡同志。他们把我俩押到上鼓楼的门洞里，一个枪口对着我们，一个在鼓楼洞前巡逻。我坐在那里，看马，既肥壮，又高大；看人，既黑瘦，又怪样。这时，我的心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暗想，如果是马步芳的兵，我俩就革命到底了。并内心责备不该在情况未弄清前就把自己的身份如实告诉他们。这个监视我们的兵看我心有所思，便解开纽扣亮出了内衣上的胸章，十分和蔼地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扣留你们是军事的需要，只要和陇右游击司令部取得联系，证明你们是游击队的人，我们就是同志。”我故作镇静地说：“不害怕。”这时心里稍安定了一点，因为国民党的兵，特别是马步芳的兵，绝不会对自我介绍为游击队的人表示如此和好的态度。

处于逆境的时间就是漫长。古人说“度日如年”，大概也是处于逆境的感受。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刻，突然听到嚓、嚓的脚步声进入鼓楼洞内。不一会，大约将近10个人从我们面前一掠而过，我发现万良才同志和伪自卫大队副张汉三也在其中。我立即大叫一声“杨政委！”万良才回头一看，就给陪同的一位高大身躯的军官说：“这两个是我们游击队的同志。”这位军官即向两位战士说：“是咱们自己的人。”持枪看管我俩的那位战士立即将枪交给了我，并说了声“对不起！”我只好用笑表示没有意见。

当走到万良才同志跟前，我还未开口，他便问：“害怕了吧！”我说：“当了俘虏，还有不害怕的。”他说：“我比你先当过了，我就没有

害怕。”我说：“莫非你路过此地也被他们扣了？”他说：“就是。经过说明才放我们的。”话未说完，就已经到达伪县政府了。

部队的领导归队了。我便向万良才同志询问响枪的原因，他说：解放军进城先登上东门，驻守在这里的自卫队支队长、地下党员李占民列队欢迎。然后沿城进逼到腰门，班长徐来顺向发现的伪哨兵高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人。”话声未落，那个伍云青的忠实走狗，便对着徐来顺打了一枪，不幸身亡。跟随人员立即还击，占领鼓楼的解放军应枪声向腰门伍云青营房用机枪扫射，战斗结束，打死自卫队员一人，其余弃枪而逃，连伪中队长伍云青也溜了。这就是打枪的原因。

从8月9日陇西和平解放协议达成到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陇西县城的4天时间内，以伍云青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分子煞费苦心，施展了不少阴谋诡计，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概括以上所述，择其要者有：

8日派出中统特务李海元在紫来乡仙家门村侦察桦林山“土共”的活动情况；

10日派出两个特务出外巡逻，御防“土共”潜入城内；同时11日派出5个特务绑架未逞，又在当天深夜潜伏东关城墙后，企图暗杀万良才等5同志；

12日向给他们喊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开枪，造成流血事件。

陇西和平解放中存在着严重的敌我斗争，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1989年6月

陇西和平解放回忆录

张世雄

1949年夏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为挽救残局,以马步芳代西北军政司令长官。一时抓兵运粮,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我当时担任陇西县伪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面对时局,我于6月间到兰州去找我的老军长周祥初先生,请教“何去何从”的问题。周先生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年轻人的心情我理解。但此事关系重大,你找康君实好好谈谈。”

我接着拜访了我黄埔的老学长康君实。他那时任甘肃师管区骑兵补充团团长。我们纵谈时局,都对现状极不满意。我问他有何打算?他严肃地对我说:“世雄,我相信你,请你也相信我,我联系你参加‘反马同盟’。我们以‘反马’为名,多联系地方上的进步人士,控制地方武装力量,相机准备武装起义,迎接解放。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他说必要时组织上会派他来的。“组织”?我才知道了康君实是共产党人。

然后,我去找王仲阳老先生。我们从大局如斯,如何应变保护地方,谈到和平起义的设想。王老激动地说:“老侄,这路子对了。风险是有的,我豁出老命支持你干。”我们一起又找张和平、苟少五、王蔺如商谈了这件事,他们均热情支持。我们商定:王仲阳找线与地下党游击队联系;我向国民党陇西驻军方面刺探前方战况。

7月上旬,国民党120军刘漫天师由临洮、陇西东调作战;诸马(马步芳、马鸿逵)接兵部队云集陇西,将全县15个乡、镇长拘押县中学拷打勒索,胁迫伪保、甲长日夜挨户抓兵,鸡犬不宁,民不聊

生。旧县府人员大部逃跑。7月底,国民党120军由陇南退到陇西,刘漫天师在陇西岷儿峡一带设防。

8月2日,康君实同志向我传达了“抓紧时机,就地起义,迎接解放军”的指示。

8月3日,国民党120军军长周嘉彬把我叫去,着我将地方部队部署在陇西南区仙家门线,堵截游击队活动,掩护他的部队的侧翼。我回来即将自卫队两个主力中队调往城南周家庄隐蔽,谎报已开往仙家门。

6日午夜,刘漫天师的营长罗子英率部在岷儿峡起义,撤往漳县,炮声彻夜。周嘉彬饬其部队西撤。诸马接兵部队均惶惶逃窜。

7日晨,周嘉彬将我叫去,命令将陇西所有库存粮食一律烧毁。如来不及,开仓叫百姓抢光,不能留以“资敌”。周随即乘车西去。9时许,该军工兵营撤离城防。原陇西县长李作栋(会宁县人)也要逃回家去,临行交给我周嘉彬手令一纸,仍是毁粮的事。我当时调回隐蔽的两个自卫中队控制了城防,并组织警察队及常驻陇西各部门警卫武装巡逻城关,取缔散兵游勇。接着召见了原陇西县田赋处科长何丕丞、仓库负责人王乾臣,拨给自卫队两个班,饬其严密保护仓粮。同时召见驻陇西第八兵站临时负责人熊翼(湖南人),着其督率该站警卫人员确保军粮,不得有失。俟后,在我家召请王仲阳等4位老先生,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周嘉彬的部队陆续经陇西撤退。我们的力量薄弱,为了百姓的安全,不能冒险行事。大家决定关闭东、南、西三城门,留北门让群众出入。由我假传周嘉彬的命令:情况紧急,着其续撤部队沿城南公路速向渭源行进,不得进城。城外退兵骂声不绝,就是闭门不纳。在群众的支持下,城内治安稳定,我们争取到了行动自由的余地。

8日,国民党黄祖塈军一部正经由陇西北山向兰州撤退。周嘉彬军零星部队仍经城南撤退。我们一面加强城防,以防万一;一面商定由张和平、王仲阳、苟少五、王藺如、宋步蟾、侯豫洲、柴庆丰、

张济生 8 位为和谈代表。

9 日下午 6 时,杨华圃(陇西师范教师,家住春场)送来了陇右游击队的信,约我们派代表到春场去谈判,大家非常兴奋,即时决定:(一)、完全接受游击队方面提出的条款;(二)、请对方规定我和他们的领导人会见的时间、地点及联系信号。这样,8 位代表就出发到春场去了。我在城里召集了自卫队分队长以上人员、警察局负责人、甘肃省保安司令部驻陇西第十无线电台台长方星吾、八兵站临时负责人熊翼、天兰铁路第五工程段警备队许队长及其他有关负责人等,说明陇西要走“和平解放”的路。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一致拥护。

晚 10 时,去春场的代表们回来了,说协定已达成,游击队约我到东关佛慧寺去会面。我到那里迎接了杨重义(万良才)、赵建基、汪炳锡三位同志进城接管陇西政权。他们进城后,当夜住在商会会长苟少五的楼上。

《陇西和平解放协定》一式两份,毛笔书写,各执一份。陇右工委方面签字的有王建中(陈致中)、杨重义、毛得功、杨友柏;代表地方签字的是上述 8 位代表。

10 日早起,按照协定先派人给游击队送去枪支弹药,因游击队已出发,没有送达。万良才同志即指示我召集了他要接见的人,由他阐明了党的政策,并主持组成“陇西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以张和平为主任委员,王仲阳、苟少五等为委员。出布告宣布陇西已解放,号召全体人员准备欢迎解放大军及筹备支前工作,苟少五、王振纪同志筹办兵站;刘照凡同志搞行政接收;赵建基同志负责宣传工作;汪炳锡同志负责秘书工作。这时地下党员纷纷报到接受任务。当天中午,群众自发满街张贴标语,手执欢迎旗帜,敲锣打鼓,聚集街头巷尾,尽情欢庆解放。午后,万良才同志率领我们到东关去迎候解放大军。等了约两个钟头,有人向万汇报解放军还没到,他通知大家散去后,对我说 有事要去东铺,明日回城。

11日,万良才同志回来,迁到旧县府办公,我也搬去和他同住,保护他的安全。这天,他召集旧人员训了话。

12日上午,在旧县府正召开群众会,10时左右,驻东城自卫队员来报告,解放军已到达东门,要我们去人接头。万着赵建基同志负责把会开下去。叫我跟他去东门。还未走到鼓楼下,就被解放军挡住。忽然北边响了一枪,接着枪声四起,情况不明,天又下起大雨,解放军就押着我们上了鼓楼。约20分钟后,枪声稍稀。万良才同志即向一位指挥员说明了陇西已和平解放的情况。那位指挥员说他是解放军第一军搜索连(骑兵)指导员,姓许。他领我们到东门去会见了军参谋处侦察科孙科长。孙说他率领搜索连由秦安经陇西何家门,沿渭河到达城边,看见东关一带贴满欢迎标语,东门又大开,却无人接头。他一面叫自卫队兵通知我们,一面又派了个副班长到北门去联系。这个副班长被打死了,就发生了战斗。万良才同志给孙科长讲陇西已和平解放4天了。他派了人到东铺迎候接头,解放军沿渭河来,没有去东铺,这就错过了。安排好了解放军的宿营地,万良才同志叫我去妥善地埋葬了那位牺牲的副班长(他是山西阳朔人,姓名记不起了)。这次事件是原自卫队一个中队长伍云青阳奉阴违,负隅顽抗造成的。冲突中自卫队也死了两个人。

从8月13日起解放军第一兵团经过陇西。陇西人民完整保存的大批粮食,除就地补充外,还向洮沙赶运,支援解放西宁。这是陇西人民对解放事业的贡献。大约在中旬末,万良才同志叫我去饭馆预定了两桌便席。第三天上午,他约我同岷县专署副专员赵毓文及邸建邦、刘照凡同志一起去饭馆迎候一位首长,却没有告诉我迎接的是谁。一辆吉普车开来了,车上下来4位同志(我只认识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同志),都站着在等候谁。我直朝车来的方向望去,再没来车。这时“司机”下了车,他们都拥着这位“司机”进院上楼,弄得我莫名其妙。经过万良才同志介绍,我才知道这位“司机”同志,就是名震全国的王震将军。他身着士兵服装,平易近人,谈笑风

生,使人毫无拘束之感。我有幸亲聆教诲,终生难忘。

40年过去了,当年参与“陇西和平解放”的老同志、老先生们大都逝世。往事历历在目,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概述这篇回忆录,谨表对他们衷心的怀念。

(据1982年11月原稿删节、修改)

甘南民变失败后

国民党在陇西的“清乡”纪实

王梦如

要说“清乡”，先得从“甘南民变”说起。

1935年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度路过甘肃南部，在广大贫苦农、牧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42年陇南大旱，哀鸿遍野，汉、回、藏各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频繁抓丁，勒索粮款。饱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甘肃南部各族人民，在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回族）、肋巴佛（藏族）等领导下，高举“抗丁、抗粮、抗款，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义旗，于1943年1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两、三个月，起义农民就达到10多万人。陇西、渭源等县的2000多农民，也在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领导下，组成“西北农民起义军”第15团，投入了起义军的行列。起义农军浴血奋战于临洮、武都、陇西等数10县，终因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于当年8月惨遭失败。参加起义的群众，被成批杀害。特务、警察、自卫队、民团等，到处搜捕参加起义人员。一些被害者的头颅悬挂在临洮、陇西等县的城门上，其惨状目不忍睹。“清乡”便是这一血腥镇压的继续。

农民起义一开始，甘肃省政府就通令全省，特别是南部各县，组织补充团队，自卫队、民团等反革命力量，配合地方驻军进行“缉剿”。陇西与相邻的渭源、岷县、临洮、漳县、定西等县，奉令设哨联

防。陇西西北区的阳坡、云田、高阳、马河、仁德、复兴 6 乡镇,由民团团长王安太负责,与自卫队马玉五、王子钧、陈焕然、冯思义等组成联防,时刻与定西联系;西南区的莲峰、居义、长安(当时属陇西县,1944 年划归渭源县——编者注)、首阳、碧岩、菜子、昌谷 7 个乡镇,由民团团长王殿璧、何凤宗负责,与自卫队王鹤军、张芷高、李生元等组成联防,加强与渭源、漳县、岷县联系;城关由补充团总负责,与警察局、南安、襄武、保昌 3 镇自卫队负责设防,晚间由各保、甲抽丁轮流守城防范。3 月间的某一天,一部分农民军绕道北山,城区大为震惊,下令戒严,督促群众持械登城。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省政府即刻发出通令,在毗连甘南各县进行大规模的“清乡”。于是,一场残无人道,血腥屠杀无辜人民的罪恶活动便开始了,陇西县县长丁玺奉令后,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了“清乡委员会”(时间约在 1943 年 7 月),由丁玺任主任委员,方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锦春(三青团干事长)、段泽民(补充团团长)、宋步蟾(慈善院院长)、柴庆荣(陇西师范校长)、赵振业(陇西中学校长)、卫吉如(商会会长)、伍云青(北关城防负责人)8 人为委员(据陇西县《民国档案》1943 年 7 月 28 日《陆军第 7 师 21 团团本部、甘肃第 3 清剿区指挥部、陇西县政府、陇西县清乡委员会布告》署名——编者注)。我当时在县政府任民政科科长,奉令以“清乡委员会”秘书身份参与了这次“清乡”活动。

“清乡”开始的先一天,我和巡官黄国玺奉命赶到莲峰镇接待“清乡”队伍(一团人,团长黎英)。我们首先协同长安、居义、莲峰 3 乡镇,筹备军需草料,安排“清乡”队伍住宿。第二天,丁玺和段泽民、方城骑马赶到莲峰镇,与黎团长会面,并策划“清乡”具体事宜。当天下午,由各乡镇公所人员及保、甲长引路,“清乡”队分扑各村,挨门逐户进行搜捕审讯。不分男女老少,稍有嫌疑者即行拘捕。晚间,莲峰镇大街小巷,挤满了被“清乡”队驱赶待审的人群,老弱妇孺痛哭流泣,就连即将分娩的孕妇和呱呱唤乳的婴儿也未免罹

难。经过初步“审讯”，对部分根本不晓得起义一事者，由保、甲长认领回家，嫌疑较大的关在房间，经过了两昼夜的清查审讯后，丁玺决定：把张尕彦、景海山、张崇德、焦春生、柳桂林、苏鹏程等9个人（据杨友柏著《鏖战陇右》，尚有张志厚、谢得才——编者注）押送首阳镇，设公堂严刑审讯。在严刑面前，张尕彦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几经昏厥，甦醒后犹大骂丁玺。审讯结束后，由丁玺亲手起草“罪状”，居义乡乡长周荣卿及首阳镇镇长李星桥缮写。在广场召开的大会上，由黎团长历述了张尕彦等人的“罪状”。会后，押解9人游街示众。示众一毕，即押到首阳镇堡壕边，由“清乡”部队的邓副团长监斩，9名义军全部殉难。他们还责令首阳镇自卫队，将张尕彦、景海山、张崇德3人的头颅割下，当夜送往县城，悬挂在西城门口，十余日后还无人敢来问津。

这次“清乡”，伪县长丁玺好像不多杀人不足以泄愤。我记得起义者中有个叫蒲芬的，大号蒲司令。此人在“清乡”前，不知怎么和丁玺挂上钩，背叛了起义军，被丁玺收编到警察局安置为“额外巡官”。审讯张尕彦时，张骂不绝口：“丁玺！蒲芬是我们的司令，他给了你大烟，给了你白洋、手枪，你就包庇他……。”丁玺在公堂上暴跳如雷，矢口否认，对张尕彦加以重刑。另外，柳桂林、苏鹏程两个曾在伪军中干过，都称连副（不知是那个军营的），也投向农民起义军。“清乡”开始后，由王殿壁领来交了枪马。但丁玺收了枪马又怕放了有隐患，一直押在监狱里。以后借“清乡”之机，把他们都杀害了。王殿壁也关了好多日子才保释（据陇西县《民国档案》审讯柳桂林、苏鹏程、王殿壁笔录及杨友柏著《鏖战陇右》：柳桂林，临洮人，38岁，民国30年在国民党第8战区165师驻武都的骑兵营当过连副；苏鹏程，临洮人，36岁，民国29年在国民党165师骑兵营当过连副、连长。1943年，两人均随该营营长张英杰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军。失败后，两人通过王殿壁缴长枪23支。但王从中隐瞒4支，只上交19支，被丁玺察觉——编者注）。张崇德当时是长安乡

的一个保长，“清乡”中还领路在农村搜查。不知为什么触怒丁玺，也被捆起来枪杀了。

那时我刚离开学校，初涉社会。这次参与“清乡”，在我思想上激起了久久不平的浪花，在灵魂深处受到很大刺激。便于 1943 年底申请回家了。

1988 年 5 月 5 日